

父 女 情 深

对子女，刘少奇是慈爱的父亲，也是严厉的导师。他不只关心孩子的生活，更重视对孩子的思想品质教育。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她出生在 1927 年。

当时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 在武汉 汪精卫与蒋介石遥相呼应 背叛了革命。

反动分子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只得转入地下工作。

由于环境恶劣，刘少奇只得把刘爱琴寄养在别人家。后来 那户人家为生活所迫 把刘爱琴卖给了另一家做童养媳。

直到 1938 年，刘爱琴才被周恩来派人找到，回到父亲身边。但没过多久 她又被送往苏联学习 这一去就是十年。

1949 年的夏天，刘爱琴刚刚通过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计划系的毕业考试，在过暑假。

有一天，一个同学挺神秘地来找刘爱琴 告诉了她

一个好消息。

原来，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访苏，已经到达莫斯科。

一别十年，骤然相聚，刘爱琴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说。

访苏期间，刘少奇每天的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他只能在吃饭时抽空询问刘爱琴的情况。

刘爱琴告诉父亲，自己中专已经毕业了，准备继续上大学。

刘少奇想了想 对她说：“还是回去吧 国内很快要办起许多自己的大学了。”

尽管活动安排得很紧，访苏期间，刘少奇还坚持自己洗衣服。

有一次，苏联服务员见到刘少奇住房的卫生间里晾着洗过的衣服，就对刘爱琴说：“以后不要再让他自己洗了。”

刘少奇回来后，刘爱琴转告了服务员的话。

可刘少奇却说：“不行 这点东西还用别人帮助？”
“那 我给你洗。”刘爱琴也很心疼父亲。

沉吟了一下 刘少奇说：“这倒可以 你会洗吗？”

刘爱琴说：“试试看 你看行不行。”

第二天，刘爱琴就给父亲洗衣服。谁知，她刚把衣服泡在盆里，就被服务员夺走洗干净了。

刘少奇知道后 批评女儿说：“这是叫你洗的 你怎

么让人家做了呢？人家工作也挺忙的。自己的事自己做。你现在又没什么事情。”

本想帮父亲的忙，可没帮好，又受到父亲的批评。刘爱琴满肚子的委屈，她报怨服务员：“你看看，都怪你把衣服夺走了。”

服务员笑着说：“不要紧的”，以后我偷偷地给他洗。”

“我可不敢了。”刘爱琴赶紧拒绝说。

以后，刘少奇换下衣服后，还是自己洗。

女儿劝他：“每天回来这么晚，你就不要洗了吧！”

刘少奇却说：“好说嘛，比在山沟沟好多了，水也方便。”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却教育了刘爱琴：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待人应该平等，不论是什么身份，都应该尊重别人。

四十多天后，会谈结束了。刘爱琴也将随父亲率领的代表团返回祖国。

临行前，刘少奇告诉女儿：“要回去了，你可以买点东西，做两件新衣服。”

刘爱琴没多考虑，就做了两套西式裙服。套服式样新颖大方，刘爱琴很满意。

可是，刘少奇看了以后，却说了句：“你看，衣服也不会做。”

刘少奇让女儿做衣服，是让她回国后穿的。可刘爱

琴离开祖国已经十年，对国内的情况不大了解，她不知道，那两套裙服根本没法穿，只能压箱底。这是她回到祖国以后才弄懂的。

火车开到满洲里后，代表团换乘了国内的专列。本来，刘爱琴在火车上是跟父亲一起吃饭的，换车后，刘少奇交待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国内了，不当客人，是主人了。你们要带着爱琴到餐车上去吃饭，她不应再受这个特殊待遇，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

回到北京，没过几天，刘少奇就让女儿去“上班”。

这工作是由王光美亲自联系的，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俄语课教师。

刘少奇和王光美亲自把刘爱琴送到师大女附中去报到。

在办公室里，刘少奇对校长和老师们说：“你们一定要从严要求她。”

校长说：“学校要普遍设俄语课，可是很缺教师。目前只请到了一位，是外侨的后裔。学校很欢迎新教师来。”

刘少奇明确地告诉校长：“她来这儿有两个任务：教俄语和学习中文。上语文课，按学生一样要求；教不好课，当老师要求。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而对她们迁就。”

当时刚解放不久，工资还是以小米来支付。

校长说：“另一位俄语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八百斤小

米 给刘爱琴定多少工资呢？”

刘少奇说：“可以给她点吃饭的钱。”

在场的老师们一听都笑了。有人提议：“不能低于那位老师的工资水平。”

刘少奇却说：“不行 给她够吃饭的就行了。”

后来，学校给刘爱琴定的工资是每月四百斤小米。

由于离开中国时间太长，刘爱琴对国内的情况很不熟悉。她本人又思想简单，贪玩，像个小孩子。

对女儿的这些弱点，刘少奇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总是教育女儿：“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因为工作需要，刘爱琴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时，刘少奇总要指定一些书让刘爱琴看，目的是让女儿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概况。

刘少奇指定的书中，有许多是毛泽东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

他告诉女儿：“文字上可能还念不下来 但是都应该看的 就拿它当课本吧。”

他还对女儿提出要求：“要学习做笔记 写出心得来。你觉得写得好的 给我看看。”

那时，刘爱琴的中文水平确实很低，上课点名时，许多同学的名字她都念不下来。

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她必须完成。于是她抓紧课

业余时间学习中文，实在感到困难，就去请教住在学校的语文老师。

过了一段时间，刘爱琴把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心得交给父亲批阅。

刘少奇认真地看起来。

刘爱琴耐着性子等刘少奇看完，着急地问：“是不是写得挺好的呀？”

刘少奇点点头说：“还可以。”

接着，他指着笔记本问女儿：“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五个阶级，你看看这里是几个。”

刘爱琴连忙接过笔记本，一看，自己只写了四个。

“不虚心，不仔细，丢三落四。丢了哪个？”刘少奇带着笑问。

“是半无产阶级吧？”刘爱琴想起来了。

刘少奇半带批评地说：“把半无产阶级都没有算上，看看！”

随后，刘少奇又指出笔记本上的字迹太零乱。

他说：“写字要一笔一画的，要写得工整，让人家看得懂。不能这样，外国字不象外国字，中国字不象中国字。”

他细心地把笔记中的错字和白字都指出来，并教给女儿正确的写法。

由于父亲严格的督促，刘爱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能比较流利地读理论书籍。中文水平迅速提高，会话

和写字能力都明显加强了。

1950年，刘爱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开始了大学生活。刘少奇仍没有放松对她的严格要求。

有几次周末回家，刘爱琴嫌乘电车费事，就给中南海车队打电话，要车接她。

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对女儿说：“你不能再要车了。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我坐车是工作需要，所以给我用。你给汽车库打电话，就要出别的车，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回家可以坐电车、公共汽车。”

刘爱琴对父亲辩解说：“电车站人太多。”

刘少奇说：“人家能够等你回家也不是急事，为什么不可以等？”

停了一下，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以后顺便跟我出去，可以搭我的车，你单独要车是不对的。”

刘爱琴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可不服气。她觉得这么一件小事，父亲太小题大做了。再说，她要车也征求过车库的意见，问车有没有空，能不能来，结果是人家同意才来的嘛！

心里这么想，但见刘少奇这么重视这件事，刘爱琴以后再也不敢要车了。

有一年冬天，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会。

天气转冷的时候，王光美给刘爱琴买毛线，织了一件毛衣，可她还没有毛裤。

刘爱琴喜欢滑冰，她想这件毛衣滑冰时穿正好。那

么，平时穿什么呢？她悄悄地让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买回一身绒衣绒裤，穿在了身上。

刘少奇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让人去叫刘爱琴。

刘爱琴一看父亲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妙。她机灵地抢先说：“爸爸，我买了一身绒衣绒裤。”

“为什么买了一身？你不是有毛衣吗？”刘少奇问。

接着，刘少奇批评女儿又犯了错误。

刘爱琴不满意地想：不就买了一身绒衣么，有什么了不起。一看女儿的样子，刘少奇就知道她不服气。

于是，他严肃认真地开导女儿：“你花的不是我的钱，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给的。现在实行的是供给制，家中所需都是国家配给的。自己已经有了的，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

听了这些话，刘爱琴认识到自己错了，她惭愧地低下了头。

刘爱琴就是这样，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艰苦的磨练

早在师大女附中工作期间，刘爱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没过多久，学校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刘爱琴的申

请，她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女儿立刻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刘少奇，谁知，父亲听了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喜悦。刘爱琴心里很纳闷。

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班级支部讨论了刘爱琴的入党转正问题。

一般来说，新党员结束预备期转成正式党员，只要没有犯什么大错误，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刘爱琴和周围的一些同学都认为这只是个程序的问题。刘爱琴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可同支部的党员同志却有的觉察，刘少奇对女儿的问题，看得更清。

有一次，刘少奇对女儿说：“你思想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

刘爱琴却接受不了，她想：我还要接受思想改造？我出身好，小时候受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长大，哪里有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呢？

刘少奇看到的是：女儿的不够艰苦朴素，遇事还不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只看到自己的小天地，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她没有经历过国内长期革命斗争环境的锻炼，学习和思想上都还存在问题。

因此，为了刘爱琴的入党转正问题党支部向刘少奇征求意见时，刘少奇明确地表示：“严格要求。”结果，支部大会上的讨论十分热烈。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反复衡量。最后支部通过的决议是：不得转正，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

学校党委不久便批准了支部的决定，并且将这个材料通报了学校的各个基层支部。

这件事，使刘爱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起初她想：“对我太严格了，为什么这样要求人？人是活人，又不是木头。”

在学校，她委屈地哭了好几天。但回到家里，却一点也不敢声张，因为她知道父亲是不会支持她的。

后来，她开始进行反思：自己一直以为从小到大，思想上是纯洁的。小时候吃过苦，从延安出来，又在苏联长大，父母都是革命者，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是个党员。

可她从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想素质和实际表现。她开始回味父亲一向对自己的批评和教育，开始对自己的生活道路进行深入的思考。

大学毕业后，刘爱琴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

1958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和充实教育事业，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国家计委进行了干部精简下放动员。

回到家里，刘爱琴如实向父亲做了汇报。

刘少奇说：“你们那里也动员了，好。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全盘考虑，边疆生活比较艰苦，那里缺干部，需要人。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好、身体好、有工作能力

的同志派下去 把边疆建设好。”

接着，刘少奇问女儿有什么想法。

刘爱琴随口答道：“我怎么考虑 我考虑，下放挺好呗。”

父亲紧接着问：“那么 你看你能不能下去？”

这时的刘爱琴已经开始成熟了。她没有立即表态。

但回到机关后 见到同志们纷纷报名 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想 别人能下去 我为什么不能下去 我也是新时代的青年 怎么能比别人落后 父亲不是再三批评我 说我不了解中国的事情 要到实际中去锻炼吗？

于是 她报了名。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刘少奇亲切地对她说：“你下去 我支持。你嘛 就该下去锻炼锻炼。过去你出去了几次 也跟我谈了很多 浮光掠影 实质性的问题了解得还少。这次下去就得要扎扎实实地了。”

过了几天 局领导找刘爱琴谈话 要她充分预料到各种困难，不要一时冲动。

刘爱琴坚定地回答：“组织上能批准我就下去 我很高兴。如果放在三四年前 我还不肯下去呢 现在条件成熟了 我基本上有了独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请领导放心 到下边我一定好好工作。”

经过研究 局领导同意了刘爱琴的要求 决定让她下放到内蒙古去。

1958年7月 刘爱琴告别了父亲 去内蒙古落户。

下放后 她牢记父亲的教诲 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过艰苦的磨炼 她在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生活表现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1965年2月12日，刘爱琴所在的机关党支部一致通过接受她为中共预备党员。奋斗了十几年 刘爱琴终于重新走进党的行列。

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在感到欣慰的同时 刘少奇仍然告诫女儿：“你入党了 只有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别的无路可走 虽然你走过弯路。……走了弯路不要紧，人是没有不犯错误的 人就是在犯错误、碰钉子、受挫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变得聪明 变得懂事。你们不要怕犯错误 不要怕斗争。……当然 你不要满足现有成绩 还要继续不断地前进，使成绩得到巩固和发扬！”

刘爱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我有这一天 完全是由于党长期耐心的教育 领导上及同志们的帮助和我父亲的关怀。……我真从内心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也绝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期望，坚决跟着党 永远革命 永不变质。”

特殊的家书

刘允若是刘少奇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学习和生活上曾走过一段弯路。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帮助下 他终

于步入正轨，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材。

刘允若从小受尽苦难。母亲何宝珍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南京雨花台，他又与父亲失去了联系。他当过报童，也当过学徒，甚至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

直到 1946 年，周恩来才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在江苏农村找到刘允若，并把他送到延安，送回到刘少奇身边。

对这个饱受苦难的儿子，刘少奇投入了更多的父爱，但同时，他对允若的教育和要求也更加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为此，党和国家先后派出了一些优秀青年，去苏联留学，刘允若是其中的一员。

本来，刘允若喜欢文学，也有比较扎实的学习基础。可出国后，组织上根据国家的需要，分配他到一个工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

开始，刘允若学习刻苦，加上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多数是五分。

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所学的专业与自己的兴趣不一致，学习热情逐渐减退。这时，他与系里一些同学的关系也不太融洽，于是，他向留学生党组织提出转系的要求。

我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同志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刘允若还很年轻，想问题比较简单，有

些缺点是难免的。这些缺点和问题 通过细致的思想教育是可以转变的。

考虑到刘少奇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国事繁忙 使馆党组织决定不把刘允若的问题告诉他，由使馆党组织承担起教育刘允若的责任。

但使馆党组织的帮助教育并没有奏效。刘允若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 他不仅坚持要求转学转系 改学文学或新闻专业 而且接连给父亲写了几封信 申诉他的“理由” 希望得到刘少奇的同情和支持。

接到儿子的来信后 刘少奇进行了分析。他看出儿子的要求是不对的，儿子的思想上存在严重的错误。

于是 他在百忙中 抽出时间 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教育儿子应该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批评 彻底抛弃自己的错误思想。

父亲的教导并没有打动儿子的心。刘允若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他准备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把身体搞垮 以达到中止学业、被送回国的目的。

结果，他的健康状况日渐坏下去，后来真的病倒了，而且病势沉重到不得不停止学习去休养。

在休养地 他的身体得到了治疗 但他的“思想病”却没有治好。

1956年新年刚过，他又给父亲写信，反映大使馆既不准他转系又不准他转校情况。对这个决定 他在组织上是服从了，但思想上怎么也服从不了。

他在信中写道：“从心底里厌恶自己所学的专业，越来越厌恶，兴趣怎么也培养不起来。别人越给我解释专业的重要性，我越感到烦得很。我这样想，让我学，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学（因为不学不行，组织力量的约束），反正我将来不干这一行，我去做个小学教员，我也不干什么‘飞机装备’！”

心结没有解开，刘允若抑郁寡欢，甚至失去了生活目标。

他自暴自弃地写着：“寄出这封信以后，我等着两件事：一件是也许在不久以后会在大使馆看到我这封信，第二件就是等着一顿骂。说实话，‘骂’我已经习惯领受。”

收到儿子的这封信，刘少奇感到刘允若的思想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积极与使馆党组织联系，请他们帮助教育刘允若；另一方面，他先后写了四封信，苦口婆心地劝导刘允若正视自己的错误。

在谈到学习专业的问题时，刘少奇写道：“关于你学什么的问题，在你出国以前，我曾经同你讨论过。我说，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如果别的工作不能干，可以干自己的专业。而如果没有一门专业知识，则可能不论什么工作都难于干好。你现在学完，只要五年，你的专业，不但不会妨害你将来干别的工作，相反，只会有帮助。”

为加强说服力，刘少奇列举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位伟大人物的例子进行说明：“例如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不会的，只会有帮助，不会有妨害。正如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会妨害，只会帮助他们后来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党的领袖一样。作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不只是需要一门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要有创造性的天才。”

“你说你将来去当教员，那么学好你的专业，不会妨害你去当教员，只会使你当一个更好的教员。”

就刘允若要求调转学校以及与同学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关于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调换的。但根据你的来信，你要调换学校的理由是错误的。你说：‘既不是因为功课重，又不是不喜欢学航空，而是和这一帮人处不下去。’这不能成为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

“你同这个学校的同学搞不好，到另一个学校难道就能搞得好吗？再搞不好又怎么办？还能再调换？”

转学是要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同情的，但你的理由是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谅解和同情的。而且我认为你现

在的问题也不是转学可以解决的。所以你最好不要请求转学。转学对组织对你自己都很麻烦 都要引起损失的。”

针对儿子信中流露出的不正确的情绪，刘少奇写道：“在你的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 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生一点病 是会好的 不应该影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 必须力求转变 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 否则 对于你是危险的。”

对于儿子信中暴露出来的错误认识，刘少奇谈得更多：“你在国内的时候 不多谈话 暴露你的思想问题也不多 因此 我也无法在思想上帮助你 你到苏联以后 却写了不少的信给我 因而也就暴露了你不少的思想问题 这就很好 就使我有机会针对你的这些思想问题来帮助你一下 所以我写了好几封长信给你 并把这些信转给了大使馆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也有可能来帮助你。”

刘少奇在信中指出：“对你的这种帮助表现为对你的错误思想的批评 而你是不大欢迎这种批评的 以为这种批评是说你的‘短’ 或者说是在‘骂’你。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诚恳的恰如其分的指出你某种错误的批评同‘骂人’混淆起来。骂人是对人的一种恶意的攻击 也不怎样讲究实事求是。这种毛病，我倒常见你犯过。”

“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 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